

宋季元初科舉存廢的文學史意義： 以詩歌為中心之考察*

林 巖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肇端於隋代的科舉考試，在唐代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已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晚唐之後，進士資格更是出任朝廷清要官、升任宰執的一個重要條件，門閥士族也需角逐進士科第來提升仕宦的競爭力。¹即使在五代這樣的亂世，華北雖然歷經王朝更迭，但科舉考試卻能始終舉行不輟，成為王朝正統的一個象徵。²迄於宋代，隨著科舉取士規模擴大、錄取程序趨於規範，科舉考試已成為一般士人進入仕途的主要通道。雖然宋代存在蔭補制度，使得大批官宦子弟得以憑藉父祖餘蔭進入官僚隊伍，其數量或在科舉入仕人數之上，但就上升空間和社會地位而言，卻遠遜於有科舉出身者。因此，在整個宋代，科舉考試無疑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吸引了無數的士人投身其中，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科舉社會」。³

* 本文係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宋季元初之科舉存廢與詩壇變遷」（2014年）的研究成果。承蒙三位匿名審稿人惠賜修改意見，使本文增色不少，特此申謝。

¹ 相關研究可參看吳宗國：〈科舉制與唐代高級官吏的選拔〉，《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頁57–65、85；吳宗國：〈進士科與唐朝後期的官僚世襲〉，《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頁32–43；毛漢光：〈科舉前後（公元600±300）清要官型態之比較研究〉，載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歷史考古組，上冊，頁379–404；毛漢光：〈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載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334–64；小島浩之：〈唐代精英型官員晉升仕途的形成與展開〉，載《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刊行會（編）：《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92–115。

² 金宗燮：〈五代政局變化與文人出仕觀〉，《唐研究》第9卷（2003年），頁491–507。

³ 宋代是「科舉社會」的觀點，參看近藤一成：〈宋代科舉社會的形成——以明州慶元府為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15–24。

然而，十三世紀初蒙元王朝崛起，迅速改變了整個東亞的政治格局，不僅先後滅亡西夏、金與南宋，更以征服王朝的姿態統治了全中國。元朝立國時，固然也採用了金與南宋的一些制度和政策，但是在科舉制度的取捨上，卻顯得舉棋不定。⁴結果導致在金、宋滅亡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科舉考試一直廢而不行，成為元初政治的顯著特徵之一。毫無疑問，元初科舉中斷，導致原先金、宋統治下士人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產生諸多影響，文學即是其中一個顯著的方面，學界近來對此也開始關注。⁵

但就本文而言，試圖考察的卻是：在南宋科舉社會的氛圍中，詩歌創作受到何種影響，處於何種地位，形成何種風氣？在遭遇元初科舉中斷之後，這種文學風氣是否有所改變，原有的一些文學發展趨向是發生斷裂，還是得以延續，抑或重新轉向？換言之，本文以宋元之際的科舉存廢作為切入點，圍繞這一歷史巨變發生的前後，通過長時段的考察，試圖勾勒十三世紀中國文學的演進軌跡。為了集中討論，則以詩歌作為考察的中心。

「科舉學」與「外學」：南宋中後期詩歌地位的邊緣化

唐代科舉取士，兼采譽望，士人在科場中的表現並不十分重要。所以，當時的士子盛行通過「行卷」的方式，將自己的作品繕寫裝幀，敬獻給京城的名公巨卿，以求為之延譽和向主考官推薦，以此先聲奪人的方式，引起主考官的注意，進而在科場登科。⁶這種「行卷」的風氣，也曾延續至宋初。但是隨著朝廷執行糊名、謄錄、鎖院等一系列防範舞弊措施，「行卷」的風氣終於衰歇，⁷士子在科場中的表現變得越來越重要，場屋程文遂成為考官衡文取士的唯一標準。對於這一轉變，陸游曾予指出：「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⁸

⁴ 元代科舉興廢情形可參看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八〈學校科舉之制〉，頁55–63。相關研究則有丁崑健：〈元代的科舉制度〉，《華學月刊》第124期（1982年4月），頁46–57；第125期（1982年5月），頁28–51；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頁26–59。

⁵ 相關研究可參看奧野新太郎：〈挙子業における詩：元初の科挙停止と江南における作詩熱の勃興〉，《中國文學論集》第39號（2010年），頁58–72；此文有陳豔中譯，見〈舉業與作詩——元初停止科舉與江南作詩熱的勃興〉，《科舉學論叢》2011年第1輯，頁8–14；余來明、王勤：〈科舉廢而詩愈昌——科舉廢黜與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轉變〉，《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頁136–41。

⁶ 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⁷ 祝尚書：〈論宋初的進士行卷與文學〉，載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340–62。

⁸ 陸遊：《老學菴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五，頁69。

在宋代科場中，經義、詩賦、策論是考試的主要內容，這些科場文體各有一套相應的寫作規範與程式化標準，舉子必須努力適應這些標準，並積極把握科場文風的變化，方才有可能登科。無怪乎宋人王庭珪曾發出如下的感慨：「蓋士患不能文，而場屋之文患不中有司之尺度。雖有奇偉高世之才，一語不中尺度，則棄不肯取，此場屋之文所以為尤難也。」⁹正因為科場寫作有其自身的程式，要想在成千上萬的舉子中脫穎而出，吸引閱卷考官的注意，應考舉子勢須花費大量時間去揣摩、訓練科場文體的寫作技巧，也就是說必須要在舉業上傾注心力。對於此種情形，宋人多有描述。如歐陽守道云：「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不為舉業者，吾見罕矣。苟為士，則學所當學，日孳孳以終其身。今移孳孳於舉業，於身心則無得，於天下國家則無用，然而士不敢不為者，勢驅之也。」¹⁰宋元之際的趙孟頫也指出：「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¹¹可見宋代士人如欲由科舉入仕，在其登科之前，必須傾注心力在舉業的揣摩和研習上，其父兄長輩對於他的督促，也是在舉業方面。

作為專門學問的「科舉學」

因為科舉功名的巨大吸引力，宋代應試舉子人數不斷攀升，到南宋後期已經猛增到四十萬人，¹²科場競爭因而變得異常激烈，登科中舉大非易事。¹³科舉競爭日趨激烈，舉業的研習也日趨專門化，開始變成一門特殊的學問，這在南宋後期表現得尤其明顯。宋季文獻中出現作為專門用語的「科舉學」一詞，即可視作一個標誌。如葉適為劉夙（著作）、劉朔（正字）兄弟二人撰寫的墓誌銘中述及：「正字少而喜《易》，蘄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為王介甫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為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

⁹ 王庭珪：《盧溪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三一〈答楊秀才〉，頁十四下。

¹⁰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李氏賦編序〉，頁十二上至十二下。

¹¹ 趙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序〉，載任道斌（校點）：《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六，頁133。

¹² 根據賈志揚（John W. Chaffee）的研究，十一世紀的應考人數約為二至三萬人，到十二世紀初，考生人數已接近八萬人，而到十三世紀中葉，考生人數已達四十萬人以上。見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5；中譯見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56。

¹³ 關於宋代的科舉競爭，尤其是不同地區表現出來的差異，參看拙文：〈宋代科舉競爭：一個區域分析的角度〉，載王水照、朱剛（主編）：《新宋學》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65-83。

著金石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¹⁴劉夙、劉朔分別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三十年(1160)登科，俱在前列。但與一般舉子不同的是，他們學養深厚，雖是科場文章，也寫得不同凡響。從葉適對兩人「不為科舉學」的讚譽中，已可見出南宋前期舉業開始成為專門之學。

到了南宋後期，「科舉學」一詞更是頻繁出現，顯示其已成為通行用語。如黃震在為廣德縣尉趙遠撰寫墓誌銘時，借其子之口說：「吾父幼嘗割股活其母，長魁國子監，以雜犯黜，遂棄科舉學。鴻禧任之官，強而受，受逾年即棄官歸。」¹⁵此外，宋末遺民鄧牧為其朋友謝翱作傳時言及：「謝君名翱，字臯父，延平人。蚤事科舉學，有志當世。」¹⁶

宋末遺民戴表元在追述宋季士人生活時，也多次使用「科舉學」一詞。如〈題周氏先世書帖〉中云：「余初來杭，即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既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¹⁷又如〈題萬竹王君詩後〉言及：「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¹⁸

甚至在元初科舉停廢之後，元人在述及宋人的科舉之累時，也使用「科舉學」一詞。如文章大家姚燧在為晚宋江湖士人高翥撰寫集序時云：「《菊磻集》者，高君九萬翁之所作也。九萬，舜江人，諱翥，號菊磻，世居越之餘姚。少穎拔不羈，抗志厲節，好讀奇書，厭科舉學。退然信有天命，隱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其材器教之，皆有成就。」¹⁹又如袁桷在〈題噩上人疊秀軒賦後〉中云：「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為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能冀其髣髴？是則皆吾徒之罪也。」²⁰由此可以看出，自南宋中期以後，隨著科舉競爭加劇，舉業研習已變成專門之學。「科舉學」一詞屢見，正體現出宋元士人對這一現象的認知。

¹⁴ 葉適：《水心文集》，卷十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收入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校點）：《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02。

¹⁵ 黃震：《黃氏日抄》，卷九七〈廣德縣尉趙君墓碣〉，收入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91。

¹⁶ 鄧牧：《伯牙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謝臯父傳〉，頁十三下。

¹⁷ 戴表元：《剡源集》，卷十八〈題周氏先世書帖〉，收入李軍、辛夢霞（校點）：《戴表元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253。

¹⁸ 同上注，〈題萬竹王君詩後〉，頁249。

¹⁹ 高翥：《菊磻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姚燧：〈菊磻集原序〉，頁一上。

²⁰ 袁桷：〈題噩上人疊秀軒賦後〉，載楊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五十，頁2232。

在此需要稍稍討論一下南宋科舉學的具體構成。在南宋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朝廷一直採取經義、詩賦兩科並行取士的考試方式。²¹除了論、策是兩科必考的內容之外，經義科以儒家經典測試為主，而詩賦科雖原則上兼考詩歌、律賦，但實際上只看重律賦。劉克莊云：「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²²表明詩賦科偏重律賦。所以，嚴格說來，南宋科舉學的主要考試內容就是經義、律賦、論、策。除此之外，這些考試內容在文體上皆有嚴格限定，因而具有很強的程式化特徵，²³舉子只有在遵守這些程式化要求的前提下，才能進行自我發揮，因而令應試難上加難。

作為「外學」的詩歌、古文

當舉業變成必須潛心研習的專門學問，對於那些尚未登科、還在舉業中掙扎的南宋士人來說，就必須全身心浸淫於科場時文之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揣摩和練習。相形之下，其他的學問就顯得無足輕重了。而在對這些舉子期待甚殷的父兄與師長輩眼裏，致力於舉業之外的學問，尤其是詩歌、古文寫作，更屬不務正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凸顯科舉時文的中心地位，在南宋中後期的士人階層中，甚至產生了一種將詩歌、古文視作「外學」的觀念，如葉適在追述自己早年經歷時說：「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²⁴余媿，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²⁵葉適生於紹興二十年（1150），十五、六歲時正當十二世紀六十年代，這表明南宋中期以後，以詩歌、古文為「外學」的觀念已經產生。尤其那句「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的議論，正體現出時人對於詩歌、古文的輕蔑態度。

到了南宋後期，視詩歌、古文為「外學」，以與科舉時文相對舉，似已成為流行觀念，屢屢為人提及，如劉克莊在〈跋李炎子詩卷〉中云：「然士生叔季，有科舉之累，以程文為本經，以詩、古文為外學，惟才高能並工。……余慮君之本經為外學所掩也，既誦其美，因以箴之。君父師皆以其學魁天下，詩文特其緒餘耳。」²⁵又在〈跋傅渚詩卷〉中云：「亡友王驪軒，天下雋人也，其文字膾炙萬口，其論諫雷霆一世。……傅君渚字子淵，贄余詩一帙，大篇能演而伸，短章能反之約。余覽而異

²¹ 參看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附錄三「宋代進士科省試試藝內容變遷表」，頁304。

²² 劉克莊：〈跋李耘子詩卷〉，載王蓉貴、向以鮮（校點），刁忠民（審訂）：《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卷九九，頁2555。

²³ 參看祝尚書：〈論宋代科舉時文的程式化〉，載《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頁210–32。

²⁴ 葉適：《水心文集》，卷二九〈題周簡之文集〉，頁611–12。

²⁵ 劉克莊：〈跋李炎子詩卷〉，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九，頁2840。

之，物色其人，或曰是驪軒邑子也，諸生也。……然國家設三場校士，士謂程文為本經，他論著為外學。驪軒由甲科郎擢瀛洲學士，以程文不以詩也，未知君程文何如爾。或曰君於場屋之技尤工，不發則已，發必中鵠。余曰君外學如此，本經又如此，勉之，他日為驪軒爭氣，非君而誰！」²⁶劉克莊是南宋後期詩文大家，可謂當時的文壇領袖。然而在以詩文為「外學」的局面下，他在稱讚對方詩文之餘，不忘提醒對方要注意在科舉時文上下工夫，如此方能登科中舉。這正可見出在科舉社會，詩文的重要性日趨降低，也愈發凸顯出科舉時文對於士人中式的重要性。

稍後於劉克莊的林希逸也有詩文為「外學」的說法，如他在〈林君合詩四六跋〉中云：「今場屋之士為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哂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余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爾。」²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固然有人認為從事詩文寫作必然有礙舉業，但也有士人以能寫作詩文為榮。這說明在廣大士人階層中，依然有人熱衷於寫詩作文，而這正是南宋科舉與文學之間關係的微妙之處。

科舉社會下詩歌寫作的邊緣化

正因為科舉時文決定了士人的升沉起伏，主宰了其平日的學業活動，在此功利化的學業取向下，就導致了尚在舉業中掙扎的士人輕視甚至敵視其他學問類型。無怪乎當時士人曾發出這樣的議論：「今之士，捨科舉之外，無他學也。」²⁸「今士自時文之外，無學不仇」。²⁹因此之故，自南宋中期以後，詩歌、古文寫作始終備受輕視，愈到南宋後期，地位愈趨下降。宋季士人的一些親身經歷，也佐證了這一點。

紹熙初年邵浩完成《坡門酬唱集》的編纂工作，³⁰可謂蘇門詩歌研究的功臣，然而當其為舉子時，卻是全副身心投注於舉業，根本無暇顧及詩歌、古文。這在他書首的序言中有明確的記述：「紹興戊寅，浩年未冠，乃何幸得肄業於成均。朝齋暮鹽，知有科舉計耳，古文、詩章未暇也。隆興癸未，始得第以歸，有以詩篇來求和者，則藐不知所向，於是取兩蘇公之詩讀之。」³¹

²⁶ 劉克莊：〈跋傅渚詩卷〉，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頁2874。

²⁷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三〈林君合詩四六跋〉，頁八下。

²⁸ 王柏：《魯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七〈答何師尹〉，頁十二下。

²⁹ 許棐：〈送旦上人序〉，載許棐：《融春小綴》，收入《汲古閣景宋鈔南宋群賢六十家小集》（群碧樓藏本，古書流通處刊行）第3函第17冊，頁六上。

³⁰ 邵浩〈坡門酬唱集引〉文末繫年為紹興庚戌，然紹興無庚戌之年份，顯然有誤。據四庫館臣考證，此實為紹熙庚戌之誤。見《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八七，「《坡門酬唱集》條」，頁1695。

³¹ 邵浩：《坡門酬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坡門酬唱集引〉，頁一上。

據邵浩自述，紹興戊寅（二十八年，1158）他進入太學學習時，一心專注於舉業，無暇顧及詩文。隆興癸未（元年，1163）登科之後，因有人以詩篇求和，才有意識地閱讀蘇軾、蘇轍的詩作。這與前述葉適早年的經歷在時間上恰好相當，正可相互印證。這些事例說明，至少從十二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士人為了研習舉業，不少已經不再留心於詩文了。

程公許是嘉定四年（1211）進士，他在研習舉業時，曾一度對詩歌、古文發生興趣，但卻遭到父兄的斥責。他在自己文集的序中有如下的陳述：「余自童丱，從師習舉子藝業。每竊窺古文章，輒欣然慕之。日課有程度，稍閒，則滌筆研，屏處一室中，試為詩章騷賦等作。父兄密窺，進而責之曰：『士生今世，舍科舉何自致身，而所嗜獨不爾，得無左乎？』」³²程公許的父兄向他指出，「士生今世，舍科舉何自致身」，正揭示了一般士人為何對古文、詩歌表露出輕視的態度，因為詩歌、古文無助於科舉登科。

戴表元，明州奉化縣人，咸淳七年（1271）進士。他根據自己早年的耳聞目睹，講述了宋季浙東地區士人以科舉進取，而不屑於寫詩的情形：「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為兒童時，持筆橐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閻風舒東野及余數輩人，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鍊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通愛。」³³因為一般士人都以科舉為進身之途，所以寫詩者被視為「雜流」，遭人輕視。即使有登科的進士偶爾寫詩，也往往秘不示人。因此之故，戴表元也提及，即使自己家鄉有非常著名的詩人，一般士人也不願向其請授詩歌寫作的技巧。他記述了這樣一個事例：「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壟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為『萬竹先生』。其詩醜醇委婉，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為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為，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³⁴高公端叔與戴表元同鄉，以詩名，但因科舉不得志，所以當地士人很少向他請教，這恰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詩人在科舉社會地位不高。

其實，對於南宋中後期因科舉時文主導士人生活，致使詩歌創作遭受輕視的情形，宋元時人早已有所議論，如南宋中期樓鑰就曾感慨說：「唐人以詩名家者眾，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為屠龍之技，故好之者寡。」³⁵元

³²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自序〉，頁一上。

³³ 戴表元：《剡源集》，卷九〈陳晦父詩序〉，頁116-17。

³⁴ 同上注，卷十八〈題萬竹王君詩後〉，頁249。

³⁵ 樓鑰：《攻媿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六〈跋戴式之詩卷〉，頁四下。

人林永年在為宋季趙必瑑所撰〈覆瓿集〉寫題記時也說：「唐宋以科目取士，凡習舉子業者，率多留意於場屋之文，間有兼吟事之長者，吾見亦罕矣。」³⁶元人李祁則云：「向時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亦唯務業科舉，罕有能用力於詩者。」³⁷元代中期著名詩人虞集也曾指出：「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³⁸從這些南宋中後期士人的自述，以及宋元時人的議論，我們不難發現：在一個已經成型的科舉社會，一般士人的學業與生活大都已為科舉時文所佔據和主宰，而詩歌與古文自不免受到漠視。

「詩人」身份的重新界定與「詩窮說」流行的背後

雖然科舉考試牢籠了無數士人於舉業之中，並導致詩文的地位下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但正如林希逸指出的那樣，總有一些士人無法捨棄詩文，依然堅守著自己的興趣。而且，在南宋中後期似乎也並不缺少詩人，大量江湖詩人出現便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³⁹那麼如何解釋南宋中後期詩歌地位日趨下降，江湖詩人反而大量出現？當時的士人階層，尤其是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又如何看待這些江湖詩人？下面試從科舉與士人生活方式選擇的角度稍作分析。

科舉社會與「詩人」身份的重新界定

當舉業變成一門特殊的學問，詩歌、古文寫作處於邊緣化境地的時候，究竟誰仍在堅持寫詩？從當時文獻記述來看，南宋中後期的士人階層似乎有一個普遍的看法，即只有那些不得志於科場的士人，或者是失意無聊的窮退之士，才會專門去寫詩；至於已經成名的顯宦，則只會偶爾為之。於是乎，在科舉士人的眼裏，那些失意科場而流轉於江湖間的士人，成為了詩壇的主力。

³⁶ 陸心源：《陌宋樓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九二，「秋曉趙先生覆瓿集八卷」條，頁八下。

³⁷ 李祁：《雲陽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王子嘉詩序〉，頁十一上。

³⁸ 虞集：〈澗谷居愧稿序〉，載王珽（整理）：《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504。

³⁹ 早期的研究多將南宋中後期的江湖詩人視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成員，因此研究焦點放在了哪些詩人可歸入江湖詩派之中。相關的代表性著作有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張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但是在近年來的研究中，不少學者摒棄了這種狹隘的研究視角，傾向於認為並沒有所謂的「江湖詩派」，江湖詩人的構成非常複雜，並不是相對固定的群體，雖然在詩歌風格上趨於相同，但無法以詩派的概念進行界定。參看史偉、宋文濤：〈「江湖」非「詩派」考論〉，《社會科學家》2008年第8期，頁16–21。另季品鋒〈江湖派、江湖體及其他〉一文闡述了錢鍾書對於「江湖派」的質疑，並提出「江湖體」的概念，值得研讀，見《文學遺產》2006年第4期，頁21–28。

舒岳祥是宋季浙東地區的詩文大家，在當時聲望甚高，他在宋朝滅亡之後，曾追憶前朝風氣說：「方科舉盛行之時，士之資質秀敏者，皆自力於時文，幸取一第，則為身榮，為時用，自負遠甚。惟窘於筆下，無以爭萬人之長者，乃自附於詩人之列，舉子蓋鄙之也。」⁴⁰又說：「方宋承平無事時，士有不得志於科舉，則收心於學問，放情於吟詠，自是天下樂事。」⁴¹根據他的記述，宋季士人為了追求功名，通常會以全副心力投注於科舉時文，只有那些不擅長科舉時文、於功名無望的士人，才會選擇作詩，以「詩人」自名，然而這樣的人卻是為舉子所輕視的。顯然，在舒岳祥的眼裏，時文與詩歌，舉子與詩人，已經成為彼此對立的兩個方面。

與舒岳祥大體同輩的何夢桂，則有這樣的看法：「詩始三百篇，其上公卿大夫，其下樵夫賤隸，其性情之所發，皆得以託於詩。古詩逸，五言始李陵，七言始沈、宋。詩非古意，去古猶近。科舉興，併與五七言俱廢。士非阨於山林，逸於湖海，與夫矢志於朝廷之上，而近流徙者，不暇於詩。」⁴²他認為，詩歌本是用於吟詠情性，早期的古詩、五、七言都具有這種功能；但是隨著科舉的興起，這些特質都已喪失了。除非是潦倒失意之士，或是被貶逐的朝臣，一般人都已很少寫詩。這裏不僅隱含著科舉與詩歌相對立的意味，而且明顯將詩人歸於失意之士的行列。

宋元之交的名詩人戴表元在詩壇交遊廣闊，留下了許多對於宋季詩壇極有價值的描述，其中較多涉及南宋後期詩歌寫作衰落的問題，如他自述早年學詩的經歷時說：「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為人所厭薄，以為茲技乃天下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⁴³景定、咸淳年間是南宋滅亡之前的最後二十年。戴表元當時以舉子的身份來學詩，結果為同輩憎厭，就是因為眾人普遍認為只有「窮退之人」才會寫詩，「以泄其無聊」。

另一則相關的記述，則來自他早年的交遊與觀察：「使君初為名進士時，表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為國子師，始獲因緣扳敘，償平生之慕願焉。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驚於竿櫓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為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黃倚撫者，無所施其輕重。」⁴⁴戴表元敘述了與一位方姓先輩的交遊。這位先輩不僅科

⁴⁰ 舒岳祥：《閩風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二〈跋王榘孫詩〉，頁四上至四下。

⁴¹ 同上注，卷十〈陳儀仲詩序〉，頁七上。

⁴² 何夢桂：〈清溪吟課序〉，載趙敏、崔霞（點校）：《何夢桂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五，頁140。

⁴³ 戴表元：《剡源集》，卷八〈仇仁近詩序〉，頁106。

⁴⁴ 同上注，〈方使君集序〉，頁107。

舉出身，仕宦先達，而且擅長寫詩，所以在當時詩歌被輕視的局面中，顯得迥然不群。戴表元二十六歲入太學，正當咸淳五年（1269）。從引文看，當時的士人階層要麼談論道學，要麼醉心於科舉時文，很少有人寫詩，而所謂的詩人大多是山林退士與江湖羈客。即使是那些已經成名的館閣之臣，寫詩也不過是偶一為之而已。

從時人的議論來看，詩歌寫作在南宋後期似乎已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有志科舉者不願寫，仕宦顯達者又不熱衷，只有科場失意的士人，以及潦倒落魄的山林退士、江湖羈客，才會寫詩來宣洩無聊，寄託精神。這幅景象到底有多少真實性，顯然還有待進一步的驗證，但卻透露了當時士人階層一種潛在的意識：即一方面將科舉與詩歌、舉子與詩人彼此對立，另一方面卻又將詩人與科場失意的舉子、山林退士、江湖羈客等人物聯繫在一起，於是乎詩人成為了一個科舉體制之外的群體。這樣一種不自覺的觀念建構，實際上等於在重新界定詩人的身份。那些身處科舉體制之外專心寫詩的江湖士人，即被稱為「詩人」。結果，「詩人」的身份也因此被狹隘化、專屬化。儘管如此，這卻多少為那些疏離於科舉體制之外的士人提供了另一種身份認證。因之，放棄科舉、專力於詩歌寫作，也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詩人」也逐漸成為一種士人類型。總之，宋季江湖詩人的大量出現，以及他們的生活處境，促成了這種觀念的形成。

江湖詩人的游謁風氣與科舉士大夫的批駁

既然詩歌已經成為科舉體制之外士人的消遣工具，那麼促使他們寫詩的動機是甚麼？難道寫詩純粹就是為了精神有所寄託，而不受現實社會干擾？或者說失意潦倒的江湖詩人只是純粹的詩歌愛好者？那麼，他們賴以為生的又是甚麼？從南宋後期士人對於江湖詩人的評論，我們卻看到了江湖詩人極其世俗的一面，雖然其中摻雜了偏見，略帶諷刺的成分，卻也有大部分的真相在內。

原來江湖詩人並非那麼純粹的詩歌愛好者，因為生計的緣故，迫使他們必須遊走社會，通過干謁權門來獲取現實的利益，而詩歌恰恰成為他們敲開權貴宅第大門的憑藉。對於這一現象，林希逸曾有如下的描述：「詩，雅道也，幾敗於唐，唐人以為進士業也。然而不敗者，李杜韓柳元白諸賢，不可得而束縛也。今世之詩盛矣，不用之場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為游謁之具者。少則成卷，多則成集，長而序，短而跋。雖其間諸老，亦有密寓箴諷者，而人人不自覺，所以後村有『錦裏刀』之喻，余常恐雅道微矣。」⁴⁵在林希逸看來，宋季的詩歌寫作不僅已專屬於江湖士人，更糟糕的是，詩歌還成為了他們手中的「遊謁之具」。

對於江湖詩人遊謁風氣的形成，宋元之際詩壇名宿方回有所回顧。他在評論戴復古的詩歌時說到：

⁴⁵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鱗詩〉，頁十一上。

石屏戴復古，字式之，天台人。早年不甚讀書，中年以詩游諸公間，頗有聲。壽至八十餘。以詩為生涯而成家。蓋「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閩臺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闕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為群，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礪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⁴⁶

這段文字相當重要，屢為宋代文學研究者徵引。從中我們可以獲知許多重要信息：一是南宋中後期，社會上頗多江湖遊士，但多為術士之流，他們憑藉朝廷權貴的紹介，奔走於地方州縣，以此謀取利益；二是慶元、嘉定以後，開始有詩人效仿江湖術士，成為社會上奔走的謁客，戴復古、劉過即是其中表表者。風氣形成之後，不少士人乾脆拋棄舉業，謀求朝廷權貴的薦書，到處徵逐名利，結果獲得豐厚的饋贈；三是江湖詩人如阮秀實（梅峰）、林洪（號可山）、孫惟信（號花翁）、高翥（號菊礪）等，頗有勢力，能夠臧否人物，影響士大夫的聲譽，因而廣受敬重。

從方回的話可知，南宋時期江湖上出現了一個遊士群體，他們原先不過是術士之流，藉著干謁謀求生計；進入南宋中後期，隨著江湖詩人的加入，他們也開始成為謁客階層的一員。⁴⁷這些江湖謁客莫不奔走權門來謀求利益，所不同者，江湖術士憑藉其技藝，江湖詩人憑藉其詩藝，如此而已。質言之，江湖詩人也不過是江湖遊士的一部分，有大體相同的謀生方式。⁴⁸而就這些江湖詩人的出身來看，他們大多是科舉不第的失意士人，如出身世家的元人袁桷所指出：「宋承唐舊，巖居逸士，見於聘徵，游者益恥。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輒為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輦粟，求筦庫之職以自活。」⁴⁹這說明在宋季末年，落第士人往往並不是回到家鄉，而是憑藉自己的文學才能到處遊謁，遊蹤遍及京、淮、閩、廣等地，甚至有數十年不歸者，所為的也不過是糊口而已。

江湖士人之所以在社會上遊走，除了因為利之所在，也因為當時社會上頗有一些名公巨卿賞識他們的詩歌才華，這就為那些科舉不第而有詩歌才華的士人，提供了一個獲得社會認可的方式。戴表元就舉了這樣一個例證：「往時吾州梟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

⁴⁶ 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戴復古《寄尋梅》評語，見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40。

⁴⁷ 參看張宏生：〈南宋江湖謁客考論〉，載《江湖詩派研究》，頁323–57。

⁴⁸ 參看費君清：〈南宋江湖詩人的謀生方式〉，《文學遺產》2005年第6期，頁52–62。

⁴⁹ 袁桷：〈贈陳太初序〉，載《袁桷集校注》，卷二三，頁1187。

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鳧磯之徒，雖鶉衣芒屨，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靳之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⁵⁰劉良佐窮困潦倒，但因為有詩名，受到了范成大、陸遊等名公顯達的推重，這對於江湖詩人來說，無疑是莫大的慰藉。正因宋季末年有禮遇江湖詩人的風氣，所以才會有許多失意的士人「挾詩以遊」。

詩本屬雅道，用於吟詠情性，一旦被科舉落第士人用作「遊謁之具」，作為奔走權門、獲取利益的憑藉，在南宋後期形成風氣，這就在士大夫階層中引起了反感。不僅林希逸曾發出過「雅道微矣」的感慨，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更大不以為然，嚴加批駁。以至認為，這種干謁行為有辱斯文，不如專心於科舉時文為正業，如宋季名臣江萬里云：「詩本高人逸士為之，使王公大人見為屈膝者，而近所見類猥甚。不能於科舉者必曰詩，往往持以走謁門戶，是反屈膝於王公大人不暇，曾不若俛焉科舉之文，猶是出其上遠甚。」⁵¹更有人對江湖詩人趨附權貴的行徑不屑一顧，如歐陽守道云：「江湖間以詩人自命，吾謂其侶魚蝦而友麋鹿。然開卷視之，則題曰呈某人者，往往貴人也。貴人者豈真與四方上下，相從為雲龍耶？」⁵²

不僅如此，江湖詩人間還有一種風氣，他們到處干求名公顯達為自己的詩集題寫序跋，以此自高，這也惹人反感，如林希逸就以嘲諷的口吻說：「江湖諸友，人人有序有跋，若美矣。或以其淺淡，則曰玄酒太羹；或以其虛泛，則曰行雲流水；疎率失律度，則以瑞芝曇華目之；放浪無繩束，則以翔龍躍鳳譽之。譏侮變幻，而得者亦以自喜。後村翁每以『錦裏刀』為笑者此也。」⁵³那些受託撰寫序跋的名公，礙於情面，即使面對平庸不堪的詩歌，也只得說些浮泛的稱讚話，以此滿足請求。但是得到名公序跋的江湖詩人，卻因此洋洋自得。

這種虛矯浮誇的習氣遭到了一些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嚴厲拒斥。寶祐元年(1253)狀元姚勉就曾回絕了一位江湖詩人求寫集序的請託，並在回信中大大批駁了一番：

降於今時，甚矣陋習。纔能為里巷之咏，即自曰江湖之人。以詩自名者，於道已卑；借序為重者，其格益下。不求工於鍛煉，第欲假於鋪張。儻無劍如千口之垂，又何袞袞一字之用。銜鼠璞為燕玉，寧取信於荊和；譽嫫母為西施，但可欺於師曠。一經品題，固作佳士；苟輕許可，此亦妄人。與其稱三好以誤其一生，孰若效寸長以補其尺短。伏想高明之見，必俞狂謬之言。

⁵⁰ 戴表元：《剡源集》，卷九〈朱伊叟詩序〉，頁122。

⁵¹ 陳起：《江湖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五，「高吉」條，頁二十上。

⁵²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十九〈題姚幼開皆山樵語〉，頁九上。

⁵³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十三〈林君合詩四六跋〉，頁九上。

省元學士耽句如癡，好游成癖。新章累牘，大集成編。鎔意鑄辭，欲作出月穿天之巧；飴餐枕寐，莫非批風判月之詞。借聽於聾，使削其聖。願不隨於流俗，期益進於古人。吟家稱張祜之詩，只消兩句；《文選》愛景陽之作，能用幾篇。貴乎工，不貴乎多；求其傳，豈求其序。別三日刮目相待，豈復阿蒙；得一顧增價遂高，終逢伯樂。僕無敢僭，子有餘師。⁵⁴

這封少有的信件，反映出當時科舉成功士人對於江湖詩人的不屑。更因姚勉的狀元身份及其斷然拒絕的態度，而增添了幾分蔑視的味道。從信中「以詩自名者，於道已卑」，「省元學士耽句如癡，好游成癖」等語句來看，無不隱含諷刺。所以，姚勉不僅是對江湖詩人「借序為重」的行為表示不滿，更是對江湖詩人這個群體的生活方式表示反感。江湖詩人干謁權貴的行徑、央求名公題寫序跋的風氣，又進一步導致科舉出身的士大夫輕視那些自我標榜的「詩人」，於是「詩人」身份愈益附著到落第士人的身上，從而被大大狹隘化了。

「詩窮說」流行的背後

北宋中葉詩人梅堯臣在當時聲望極高，不只受到同輩好友歐陽修的推重，劉克莊更譽為宋詩的「開山祖師」。⁵⁵然而終其一生，卻是長期沉淪下僚，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所以在他去世之後，歐陽修為其詩集作序，曾有如下的一番議論：「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⁵⁶結合詩人的身世遭際來論其詩歌工拙，也許是歐陽修想為梅堯臣詩的成就提供合理解釋。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這一「詩窮說」卻在後世不斷引起討論，幾乎成為貫穿整個宋代詩學的核心議題。特別是在南宋中後期，「詩窮說」更是被屢屢拈出，成為一個通行的話頭。⁵⁷

⁵⁴ 姚勉：〈回張生去華求詩序〉，載曹詣珍、陳偉文（校點）：《姚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二五，頁291-92。

⁵⁵ 劉克莊云：「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見《後村詩話·前集》，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頁4438。

⁵⁶ 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載《居士集》卷四三，收入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612。

⁵⁷ 史偉指出，「詩窮」說「真正泛化為一種人人之常談，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卻是在南宋中後期」；「若翻檢宋元之際的詩文序跋，會發現『詩窮』說幾乎是其時出現頻率最高的『共同話題』，這在此前是不可能見到的」。見史偉：《宋元之際士人階層分化與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279-80。

江湖詩人對於「詩窮說」的話題尤為津津樂道，並發表了各式各樣的意見。試舉數例，以見一斑。江湖詩人中的名士戴復古有詩云：「萬事忌於懷壯志，一生窮為聳吟肩。」⁵⁸又有詩云：「自甘寂寞坐詩窮，何取多牛積穀翁。」⁵⁹倘若這還算平和的話，那麼江湖詩人朱繼芳的詩句就有些顯得激烈了：「莫吟詩，詩能窮人君不知。古人坐詩窮到骨，今人方笑古人癡。」⁶⁰這幾乎是將窮困當成了詩人的宿命。

毫無疑問，江湖詩人熱衷於發揮「詩窮說」，與他們失意困頓的生活處境密切相關。⁶¹他們固然有人可以因緣際會，得到達官貴人的資助，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更多的江湖詩人恐怕還是孤立無援的。在當時人看來，江湖詩人生活困頓，原因之一就是在一個以科舉為士人主要進身途徑的社會，執著於寫詩毫無前途可言。背離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注定要處於困境之中。正如前述葉適早年的經歷，他從長輩那裏得到的教訓是，在一個科舉時文主宰士人命運的時代，詩文不過是「外學」，而「外學，乃致窮之道也」。

南宋後期詩文大家劉克莊曾有過長期作為江湖詩人的經歷，因而與江湖詩人群體有廣泛而密切的交往。他對於江湖詩人生活困境的關注，就更多地是從科舉與詩歌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如他曾有詩云：「元祐賦律古，熙寧經義新。請君忙改藝，詩好誤終身。」⁶²意思是說，無論朝廷的科舉考試內容怎麼改，都沒有詩歌的一席之地，所以要想進取，寫詩是毫無用處的。而在另外一篇寫給江湖詩人的贈序中，他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本朝文治過唐遠甚，經義詞賦之士悉尊寵用事，惟詩人遇合者少。內而公卿，外而強大諸侯，窮貴極富，致士滿門，類多抵掌談功名、飛筆作牋記者，未嘗容一詩人也。君為一世所不好之學，挾背時難售之貨，僕饑驢瘦，道之云遠，夜闌酒盡，相對太息。」⁶³劉克莊試圖說明，在這樣一個追求功名的社會，詩人並無容身之地，因為在很多人的眼裏，詩人不過是「為一世所不好之學，挾背時難售之貨」。這話雖然過於憤激，但也許他是想警告這個詩人要認清社會現實。

更為難得是，劉克莊還舉了一個例證，說明士人為詩歌所誤。這位執著於寫詩的士人名周天益，劉克莊為其詩集作跋，因而有如下的記述：「君生於福而僑於劍，劍人皆沿崖臨流以居，望之如在圖畫間。然多水患，壬子〔淳祐十二年，1252〕溪

⁵⁸ 戴復古：〈黃州偶成〉，載吳茂雲、鄭偉榮（校點）：《戴復古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卷六，頁172-73。

⁵⁹ 戴復古：〈甘窮〉，載《戴復古集》，卷六，頁217。

⁶⁰ 陳起：《江湖小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二，朱繼芳：〈行路難贈蕭坦翁〉，頁十五下。

⁶¹ 相關論述參看費君清：〈詩工命窮——論南宋江湖詩人的悲劇人生〉，《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143-50。

⁶² 劉克莊：〈跋某人詩卷〉，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頁263。

⁶³ 劉克莊：〈送謝昨序〉，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頁2491。

漲，至冒城郭，君之草廬毀焉。家具蕩盡，獨橐其詩來訪余，余為作詩勸緣。後八年復至，曰：『吾廬雖復舊觀，然年益長，身益衰，溪山風月雖美，如饑何？』余問別後所為，君又出橐中詩，數倍前作。余語君曰：使君之家室屢漂搖、屢拮据而未定者，溪誤之也；使君之身世栖栖然浪走於江湖、見遺於場屋者，詩誤之也。意君厭且倦矣，將改圖矣，而君尚戀溪不忍去，耽詩不輟吟，人固有嗜好與世如是之相反哉！」⁶⁴ 這位周姓詩人家園遭水患沖毀，劉克莊給予過幫助。但是八年之後兩人重逢，劉克莊發現他窮困如故，因而意識到他窮困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於完全放棄了科場進取，只是耽於吟詩，所以才會有如此的結局，因而發出「詩誤之也」的感歎。

從上面的論述，尤其是借助於劉克莊的描述，我們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江湖詩人特別樂於發揮「詩窮說」，那是因為他們大概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在一個科舉時文決定士人進取的時代，詩歌是無助於登科中舉的，因而也只能窮困終身。這又從另一個角度再次證實了南宋中後期詩歌寫作式微的處境。

元初的科舉停廢與詩壇的新動向

十三世紀蒙元崛起，迅速地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蒙古軍隊幾乎以席捲一切的態勢，先後滅亡了西夏、金朝和南宋，建立起一個疆域廣闊的征服王朝。然而當元朝確立對全中國的統治之後，在統治方式上卻面臨草原文明與漢地文明的衝突。我們看到，面對原先金、宋統治下在華北和江南廣泛存在的科舉制度，元朝統治者表現出了猶豫和躊躇，其結果則是遲至延祐元年(1314)才首開科場。由此導致江南科舉中斷四十年，而華北則長達八十年，成為近世史上停廢科舉最久的一次。⁶⁵ 毫無疑問，科舉停廢造成了金、宋士人生活方式大為改變。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長期受科舉之累的士人，也多少獲得了解放，可以就自己的興趣愛好而投身不同的領域。元初詩歌創作突然興盛，即是這一歷史轉變下的特有產物，值得關注。⁶⁶ 尤其是對原先科舉社會下的江南士人而言，他們對於詩歌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詩歌的地位也隨之上升；然而南宋中後期所形成的一些風氣卻並沒有突然衰歇，甚至有加劇之勢。

⁶⁴ 劉克莊：〈跋周天益詩〉，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頁2802。

⁶⁵ 蕭啟慶：〈導論：元代的科舉制度及文獻〉，載蕭啟慶：《元代進士輯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頁28。

⁶⁶ 奧野新太郎較早注意到元初科舉廢除之後，詩歌創作出現興盛的局面，但他主要是通過回溯金、宋統治下華北與江南舉業與詩歌之間的緊張關係，以一個宏觀的視角來揭示其形成背景，對於元初詩歌興盛本身考察不多。余來明也注意到元初科舉廢而詩愈昌的情形，但論述的角度偏重於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轉變，對於元初詩歌本身的地位、作用、創作情形，則不甚留意。兩文在文獻資料的搜集方面，也略顯不足。見奧野新太郎：〈舉子業における詩〉，頁58-72；余來明、王勤：〈科舉廢而詩愈昌〉，頁136-41。

元初科舉停廢與詩歌地位的改觀

南宋中後期士人以科舉求進取，囿於舉業，詩文被視作「外學」，不受重視；而作詩者多是落第舉子、山林退士，以詩歌為「遊謁之具」，奔走於江湖，成為所謂的「江湖詩人」。可是科舉一旦廢除，士人失去了藉此進身的途徑，科舉與詩歌之間原有的對立突然消失了，寫詩不再受到歧視，於是作詩的士人頓然增加起來。

對於這一轉變，元初文獻有大量記述，如宋末遺民何夢桂說：「近世學者廢舉子業，好尚為詩。」⁶⁷戴表元說：「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⁶⁸陳櫟則說：「爰自科舉廢，士以詩為習。」⁶⁹而概括較為全面的，則為宋元之交的著名詩歌評論家劉辰翁。他說：「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為詩，於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前之亡，後之昌也，士無不為詩矣。」⁷⁰從這些議論來看，元初的士人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出，長期的科舉停廢促使士人轉而寫詩，因此造成了詩歌創作興盛的局面。

那麼原先的場屋舉子為何會將精力投向詩歌？當時的士人階層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就是認為原先士子投注了全部的精力於科舉時文之中，無暇作詩，現在科舉廢除，士人的才華無處表現，於是藉詩歌來展露。何夢桂就曾感歎說：「科舉業廢，士以醇噫之氣鬱發於詩，詩之工而文之窮也。時異世殊，士之技亟變如此。」⁷¹他所說的「文」，其實主要就是指科舉時文。陸文圭則說得更為直接：「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為詩。」⁷²甚而在科舉長期停廢之後，有士人認為能夠寫詩就足以表明自己的士人身份了，如元代理學大家吳澄指出：「自進士業廢，而才華之士無所寓於其巧，往往於古今二體之詩。然稍有能，輒自負曰：『吾能是足矣。』豈知士之為士，有出乎詩之外者哉？」⁷³與吳澄同輩的胡炳文也感慨道：「近年以來，科舉未興，學者但知臨晉帖、誦晚唐詩，筆迹聲氣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漫不知經學為何事。」⁷⁴從這些同聲同氣的說法可以見出，科舉廢除之後，士人必須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以往他們藉著科舉考試來證明自己是士人，現在科舉中斷，寫作詩歌，甚至練習書法，遂成他們維持士人身份的一個標誌。

如果說上面的論述還略顯籠統，那麼下舉的事例就足以展現元初士人的這種轉變。首先是戴表元與其友人張君信早年共同學詩的經歷：

⁶⁷ 何夢桂：〈王石澗臨清詩稿跋〉，載《何夢桂集》，卷十，頁240。

⁶⁸ 戴表元：《剡源集》，卷九〈陳晦父詩序〉，頁117。

⁶⁹ 陳櫟：《定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七〈張純愚與先生書〉，頁二二下。

⁷⁰ 劉辰翁：《須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程楚翁詩序〉，頁九下。

⁷¹ 何夢桂：〈宋君異詩序〉，載《何夢桂集》，卷七，頁185。

⁷² 陸文圭：《牆東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跋陳元復詩稿〉，頁十四下至十五上。

⁷³ 吳澄：《吳文正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七〈周立中詩序〉，頁七上。

⁷⁴ 胡炳文：《雲峰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代族子澗上草廬吳先生求記明經書院書〉，頁二上。

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鞠、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於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難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之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為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為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慍若狂，始放意為詩，不復如前時卻行顧忌。⁷⁵

戴表元還是舉子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學寫詩，但為舉業所牽絆，不敢過於耗費心力，只是在登科之後才全心寫詩。他的朋友張君信雖擅長舉業，卻總是在科場中連連失利，結果連寫詩都遭到前輩嘲笑，始而自慚，終於放棄。然而，科舉廢除之後，張君信不為舉業所累，終於可以縱情寫詩而毫無顧忌。兩人前後學詩處境的不同，正說明元初科舉停廢，確實解除了士人寫詩的束縛。

其次是黃庚幼年生活於南宋的經歷。他述說了元初擺脫舉業之後，得以盡心寫詩為文的暢快心情：「僕自齠髻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何暇為推敲之詩、作閒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為詩文。且歷攷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醜雞之出甕天，坎蛙之蹄涔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為之，惟吟咏情性，講明禮義，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也。」⁷⁶他的經歷說明，當科舉廢除之後，士人的確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泛讀，又可以從事文學寫作，這在科舉時文主宰士人生活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

再其次是吳澄的見聞。他記述了一個士人家庭的成員，在科舉存廢前後，各自與詩歌的關係：「唐人詩可傳者，不翅十數百家，而近世能詩者何寡也。場屋舉子多不暇為，江湖遊士為之，又多不傳，其傳者必其卓然者也。往年鑑溪廖別駕，以名進士為學子師，既宦遊，徧歷嶺表，始有詩曰《南冠》、《吏退》。其從子業舉子，未仕，亦有詩曰《月磯漁笛》。《吏退》之語清而韻，《漁笛》之聲奇而婉，雖不傳於人，吾固知其詩也。雲仲，亦別駕君從子。自選舉法壞而其業廢，遂藉父兄之餘為詩，且韻且婉，鏘然不失其家法。」⁷⁷吳澄首先用「場屋舉子」與「江湖遊士」對舉，揭示南宋末人對詩的態度，等於重申了晚宋林希逸「今之詩盛矣，不用之場屋而用之江湖」的觀點，也進一步印證我們此前的論述。接著他敘述了這個士人家庭寫詩的情形。廖姓官員是登科之後，在宦遊生涯之中，才開始寫詩的；他的一個侄子，雖習舉業，但並未走入仕途，估計是科場失意，也開始寫詩；另一個侄子，則是因為科舉停廢，所以才追隨父兄寫詩。我們現有的結論，正好印證了吳澄的觀察與描述。

⁷⁵ 戴表元：《剡源集》，卷八〈張君信詩集序〉，頁113。

⁷⁶ 黃庚：《月屋漫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月屋漫稿原序〉，頁二上至二下。

⁷⁷ 吳澄：《吳文正集》，卷十五〈出門一笑集序〉，頁一上至一下。

前文曾引述一個事例，說明在南宋後期因詩歌地位下降，即使地方上有著名的詩人，士子也不會前往求教詩藝。但是科舉廢除之後，情勢大為改觀，士人開始積極向詩壇名宿討教。詩家方回就有這樣真切的體會：「近世又有所謂科舉穿鑿之學、箋註偶儷之學，畔義理而逐時好，豈不痛哉！物極而返，今之為士者，一切不講，惟詩辭之學僅存。予，朱子之鄉晚出者也，仕而歸老，去朱子之沒未百年，求所謂義理之學者，不一見焉。而以詩歌之學求予講畫者，則不勝其眾，於眾之中，而察夫胷中、筆下之不凡者，又僅一見焉。」⁷⁸他說早年士人追逐科舉之學、箋注偶儷之學，但是現在的士人卻只講求詩辭之學。雖未明言，但這一轉變的關鍵，顯然是科舉已經廢止不行。當他回到家鄉徽州，想到這裏是理學大儒朱熹的故里，卻無人尋求義理之學，反而有不少士人請他講授詩歌之學，不禁感慨係之。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當科舉廢除之後，學習作詩的人確實多了起來，詩歌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不再受到士人輕視。

元初詩壇遊謁風氣的承繼

元初科舉廢而不行，一方面解除了士人的負累，促成了作詩風氣的興起；但另一方面，由於江南士人失去了主要的進身之階，要謀出路也不得不另尋他途。因為元代仕進多途，達官顯貴的舉薦可以幫助士人入仕，結果就進一步助長南宋中後期的遊走干謁之風，成為元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現象。⁷⁹甚至有學者認為，元代士人的遊走干謁，無論在人數規模上，還是在干謁的途徑方式上，均超過了南宋中後期。⁸⁰

元初遊士之風大興的原因雖然相當複雜，但科舉停廢顯然是一個主要的動因。對此，宋末遺民吳澄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他說：「嗚呼！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進仕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跋涉攀援，百計干人，經歲年，敝衣履，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殞軀而不悔，愚亦甚哉！」⁸¹南宋科舉要求士人歸本貫取解，

⁷⁸ 方回：《桐江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二〈吳雲龍詩集序〉，頁二四上。

⁷⁹ 關於元代出現的遊士以及干謁風氣，學界早有注意。相關研究有丁崑健：〈從仕宦途徑看元代的遊士之風〉，載蕭啟慶（主編）、許守泯（協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635-53；史偉：〈元初江南的遊士與干謁〉，《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9期，頁112-20；後收入《宋元之際士人階層分化與詩學思想研究》第五章，並略有擴充。這兩篇文章都是相對全面的研究，與本文著重點不同；但史偉的文章已經注意到元初士人以詩文為謁具的問題，則本文頗受啟發。另丁崑健認為：「遊士之風在南宋滅亡之前，固已存在于華北，但未存在於江南。」揆諸史實，這一觀點顯然無法成立。

⁸⁰ 史偉：《宋元之際士人階層分化與詩學思想研究》，頁178-79。

⁸¹ 吳澄：《吳文正集》，卷七三〈故逸士熊君佐墓誌銘〉，頁二下。

要參加地方州府的解試，所以絕大多數士人還是安於鄉里。但是元初科舉停廢，沒有在鄉取解的必要，再加之仕進多途，這就誘使士人輕去鄉里，遊走四方。

另外，元人自己也認為遊士之風的消長，與科舉的行廢有直接的關係，如劉詵說：「自宋科廢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復而游士少，數年科暫廢而游士復起矣。蓋士負其才氣，必欲見用於世，不用於科則欲用於游，此人情之所同。」⁸²元代科舉自延祐元年(1314)恢復，開科七次之後，至元元年(1335)中斷；到至正元年(1341)重開科場，又舉行九次。⁸³依照劉詵的觀點，科舉中斷的時候，士人的才華無所表現，就一定會通過遊走干謁的方式來實現自我價值。

對於元初遊士風氣盛行，當時文名頗盛的朝中之士袁桷更有詳說，有助於認識這一社會現象。他說：「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復廣於昔，弊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闔，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遇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⁸⁴前文嘗引述袁桷關於宋季末年遊謁之風的描述，結合他這裏對於元初「游復廣於昔」的觀察，可以看出，宋季江湖遊士(包括江湖詩人)的干謁之風，到了元代，不僅沒有隨著科舉停廢而消歇，反而愈演愈烈。袁桷還指出，遊士出現最多的地方就是江西。

元初的遊走干謁者品流複雜，但其中也確有相當一部分士人憑藉詩歌作為干謁之具，奔走於權貴之門，如方回就說：「近世為詩者，……又且借是以為游走乞索之具，而詩道喪矣。」⁸⁵袁桷說：「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⁸⁶這些都說明在元初詩壇也有這種遊走干謁之風。大德三年(1299)，方回撰〈送胡植芸北行序〉，對這種現象力加批評：「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為五七言。無風雲月露、冰雪煙霞、花柳松竹、鶯燕鷗鷺、琴棋書畫、鼓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為干謁乞覓之貨。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⁸⁷在方回看來，那些所謂的詩人，不過是借助於淺薄的詩歌，諂媚逢迎，藉此獲利，甚至不惜美化那些敗將降臣，簡直是厚顏無恥。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種風氣，是從宋季的江湖詩人開始，只是變本加厲罷了。

⁸² 劉詵：《桂隱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送歐陽可玉〉，頁八下。

⁸³ 蕭啟慶：〈導論：元代的科舉制度及文獻〉，頁18。

⁸⁴ 袁桷：〈贈陳太初序〉，頁1187。

⁸⁵ 方回：《桐江集》，《宛委別藏》本，卷一〈滕元秀詩集序〉，頁二一。

⁸⁶ 袁桷：〈送范德機序〉，載《袁桷集校注》，卷二三，頁1162。

⁸⁷ 方回：《桐江集》，卷一〈送胡植芸北行序〉，頁一百二。

總之，元初科舉考試的中斷，在改變士人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兩個方面深刻影響了詩壇的走向：一是那些昔日的舉子，才華無所宣洩，轉而投身於詩歌寫作，甚而詩歌寫作也成為士人身份的一個重要標誌，由此詩歌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而對於那些原本喜愛寫詩的士人來說，則在擺脫了舉業之累後，身心獲得了極大的自由，於是可以隨心所欲寫詩。二是士人失去傳統的進身之階，在仕進多途的情形，造成了士人遊謁風氣盛行。這使得原本在南宋落第士人中流行的遊謁風氣，在元初逐漸蔓延到了整個士人階層。這些現象無形中改變了南宋中後期以來詩歌的卑下地位，推動了詩歌寫作的繁興，從而為元代中期的詩壇中興做好了鋪墊。

元初詩壇之科場遺習一瞥

在元初科舉中斷的四十年裏，士人階層對於詩歌的態度發生了巨變，一度被視為致窮之道的「外學」，現在變成了士人身份的標誌，吸引無數先前的舉子投身詩歌創作，造成了元初詩壇興盛的局面。但是，元初的科舉停廢，是否能夠迅速抹去科舉留下的痕跡，消除科舉產生的影響？這個問題值得深究。

昔日浸淫於科舉時文的舉子，在宋亡之後，迅速轉變為吟詠性情的詩人，這個轉變真的就那麼容易嗎？舒岳祥細心觀察過一個士人的轉變，揭示了這個問題：

自京國傾覆，筆墨道絕，舉子無所用其巧，往往于極海之涯、窮山之巔，用其素所對偶聲韻者變為詩歌，聊以寫悲辛、敘危苦耳，非其志也。予久逃空谷，歲且再易，歸檢故畦，花殘藥墮，已為樵牧之場、猿狙之徑矣。王叔範館於其旁，課童子不廢。暇則穿蒙密、入窈窕，又自課以詩，出小編示予，此所謂用其素所對偶聲韻變為詩歌者耶？

噫！方科舉盛行之時，士之資質秀敏者，皆自力於時文，幸取一第，則為身榮，為時用，自負遠甚。惟窘於筆下，無以爭萬人之長者，乃自負於詩人之列，舉子蓋鄙之也。今科舉既廢，而前日所自負者，反求工於其所鄙，斯又可歎也已。叔範於舉業甚工，今當棄其所已工，得不痛惜之乎？⁸⁸

這篇文章寫於景炎二年(1277)，即南宋滅亡之後的次年。舒岳祥看到鄰居王叔範，在科舉廢除之後，以塾師為業，同時開始寫詩，因而有感而發。舒岳祥進士出身，也是名詩人，但他注意到舉子變為詩人，其實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舉子無所用其巧」，所以才「用其素所對偶聲韻者變為詩歌」，藉以攄懷。而且他進一步想到，在南宋後期，一般士人都力求登科中舉，只有那些科場失意的士人才去寫詩，並因此遭到輕視。那麼「以前日所自負者」，現在「反求工於其所鄙者」，這該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情。由此，我們就想首先討論元初舉子如何轉變為詩人的問題。

⁸⁸ 舒岳祥：《閩風集》，卷十二〈跋王榘孫詩〉，頁三下至四下。

元初舉子向詩人轉變的兩種趨向

元初科舉中斷，大批舉子轉而作詩，但是將科舉時文的寫作訓練轉而用來寫詩，會實現順利的轉型嗎？當時的文獻似乎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一派意見以為，早年的時文訓練並不會有礙於寫詩。這方面有不少的事例，如晚宋宰相馬廷鸞誇獎自己的外甥說：「王甥典謨之學，蚤有聲場屋。科舉廢，輒斂才華而為詩，政爾精麗可喜。」⁸⁹宋末遺民衛宗武介紹自己的朋友說：「吾友李黃山，儒林之秀，文場之雄，斂進取之辭藻，歸於吟詠，而一章一句俱非草草之作。」⁹⁰宋季詩文名家牟巖則提供了兩個例證，其一是高景仁：「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舉子之雄，一旦斂芒鏗，束繩墨，以為小詩，豈所甚難？然猶仡仡用力如此。」⁹¹其一是唐月心：「場屋既廢，為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實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也。唐師善，自號月心，舊時舉子業修而學博，去為詩人，詩尤工。世人往往苦心竭蹙，求合唐詩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為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處，活脫唐詩。聲名方獵獵以起，未為工而不遇也。」⁹²趙孟頫也對一位舉子的詩大加讚揚：「王君壯猷，自弱冠賦聲滿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邇來科舉既廢，王君出其胸中之蘊，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以見過，求余為之敘。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氣直，涵泳《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拔於流俗者能若是耶？」⁹³我們或許可以懷疑，這些誇獎的話是出於個人私誼，所以多溢美之言；但是這也不能排除，有些舉子確實能夠將昔日為科舉時文所下的功夫，轉化為詩歌寫作之資。

另一派意見以為，那些過去的場屋舉子，在投身詩歌寫作時，總是無法擺脫時文習氣。最明確指出這一點的是元人歐陽玄，他說：「宋訖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頒，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⁹⁴在歐陽玄看來，元初雖然有許多士人轉而寫詩，但在五十年內，幾乎未脫時文故習，所以才產生了「舉子詩易似時文」的說法。直到延祐之後，詩風才漸趨雅正。但認為科舉時文訓練會影響到詩歌寫作的觀點，其實劉克莊早就已經提了出來：「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

⁸⁹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二〈王甥儒珍集序〉，頁九上。

⁹⁰ 衛宗武：《秋聲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李黃山乙稿序〉，頁十八下。

⁹¹ 牟巖：《牟氏陵陽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高景仁詩稿序〉，頁一下。

⁹² 同上注，卷十三〈唐月心詩序〉，頁十八上至十八下。

⁹³ 趙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序〉，頁133。

⁹⁴ 歐陽玄：《圭齋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李宏謨詩序〉，頁二下。

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⁹⁵在劉克莊看來，宋朝文人多而詩人少，大部分的詩似乎都帶有經義策論文的習氣，這是令他感到不滿的地方。

然而到了元初，人們似乎更加留心昔日的時文訓練，對於詩歌寫作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如何夢桂曾就一位舉子的詩集評論說：

百照洪肅甫以明經學業舉子文，少頡頏場屋，流輩率免胄避風，卒至不偶以死，猶有詩卷流落身後。其子耕道挾故冊與諸縉紳先生昔序，復徵予言。予謂百照文士也，宜不攻於詩，觸景遇物，興至而詩亦從之，詩蓋百照筆硯膏馥之遺餘耳。驂騮逸騁，超影奔電，將一日萬里，乃絡首羣足，使之折旋鉤百於蟻封間者，政懼不足以盡夫才也。文人之技折而歸諸詩，正類此。頃嘗與友人譚詩，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異，友曰：「不然，詩患不到好處。詩到好處，又奚文人、詩人之辨哉？」此語真詩家陽秋也。⁹⁶

何夢桂在文中提出了「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這兩個概念，「文人之詩」就是指那些帶有科舉時文氣息的詩。他認為這種詩與「詩人之詩」有顯著的區別，正含蓄地表達了一種不滿。

至於舉子詩為何無法消除時文故習，元僧釋圓至給出了比較合理的解釋：

某嘗謂：宋之文，始振於天聖，極盛於熙寧，初衰於王氏經義，大壞於伊洛訓詁。士大夫於學，能是二者，已足釣位而網名矣。更化以來，場屋精舍之路既廢，宿師老生稍棄其舊而趨於古。然入之既深，絕之已遽，是以未獲其所欲而先喪其所能。務為離奇佶屈、鉤咽戟吻之辭，以矯其舉子之聲，而律呂蹇逆，粉墨黝雜，反不逮其課試所為者。夫蛇所以能為龍者，固以其蛻也。然不深蟠久，伏以待其質之自化，而剝其皮，抉其骨，速求其為龍，則龍不可成而又喪其所以為蛇。今之棄舉子而為古者，其道類是。⁹⁷

正因為舉子寢饋於科舉時文的時間太久，陷溺過深，所以再怎麼努力擺脫也擺脫不掉，這恐怕才是科場習氣在詩歌寫作中殘留的原因。釋圓至之說，可謂切中肯綮。

詩學批評中的科場習氣

既然舉子改業詩歌會帶有「時文故習」，那麼在元代的詩學批評中是否也可以發現這種跡象？儘管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但目前學界似乎才剛開始探討，還沒有特別令人滿意的結論。⁹⁸

⁹⁵ 劉克莊：〈竹溪詩序〉，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二三，頁2438。

⁹⁶ 何夢桂：〈洪百照詩集序〉，載《何夢桂集》，卷六，頁163。

⁹⁷ 釋圓至：《牧潛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與某官書〉，頁六上至六下。

⁹⁸ 參看史偉：〈元初詩壇的所謂「時文故習」〉，《蘭州學刊》2007年第6期，頁131-34；後收入《宋元之際士人階層分化與詩學思想研究》第六章第二節。

有學者認為，元代一些詩格、詩法類著作如《詩法家數》、《詩法源流》、《吟法玄微》，⁹⁹比較系統地採用了「起、承、轉、合」的分析模式來解說詩格的篇章結構，可能是受到時文程式化的影響，借用了時文的分析模式。¹⁰⁰但因我們目前對於「起、承、轉、合」這一分析模式的來源不甚清楚，對於它與詩歌分析何時結合在一起尚不明瞭，這個問題似乎還有待探討。

目前可以明確指出時文習氣影響到詩學批評的詩法著作，是舊題范德機門人集錄的《吟法玄微》。有意思的是，此書特別強調「起、承、轉、合」適於用來分析絕句，但不能用來分析律詩。該書云：「先生又曰：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律詩，則未盡然。且以律詩論之。首句是起，二句是承，中二聯則襯貼題目，如經義之大講，七句則轉，八句則合耳。」又云：「夫作經義文論之法，惟大講為實，故昔人作論，謂之論腹。作詩亦然。何獨第二聯為承、第三聯為轉耶？泥此則非律詩之法度矣。」¹⁰¹該書作者認為，律詩的中間兩聯好比經義的「大講」，具有核心的地位，所以如果以第二聯為承、第三聯為轉，就無法把握律詩的特質。該書另一處則批駁宋末周弼《三體唐詩》運用虛實進行分析的方法，同時重申了律詩中間二聯如同經義之「大講」的觀點：「問：『周伯弼所編《三體詩法》，以虛實為例。若〈早春遊望〉與〈廢寶慶寺〉詩，中之聯皆言景物，與賦比興承轉之說不同，何也？』先生曰：『……周伯弼《三體詩法》，以虛實分之，誠疎矣。然於〈早春遊望〉詩中分賦與興，未是，於〈廢寶慶寺〉詩，分興賦，亦未是。……故二詩中聯，吾以為襯貼如經義之大講為是，而轉承之說為非。……』」¹⁰²從律詩中間兩聯如同經義之「大講」這觀點，可以推測作者或許曾經是一位潛心研習時文的舉子。至少，他已開始用科舉時文的寫作程式來分析律詩的組織結構。

月泉吟社的科場遺習

從多方面體現出元初詩壇仍然受到科舉遺習影響的，大概莫過於元初月泉吟社所發起的詩歌徵選活動了。¹⁰³根據遺民吳渭〈送詩賞小筍〉所云，他所主持的月泉吟社，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月十五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的題目發起徵詩活動，於次

⁹⁹ 本文徵引的元代詩法、詩格類著作，皆出自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一書。

¹⁰⁰ 參看史偉：〈元初詩壇的所謂「時文故習」〉，頁131-34。

¹⁰¹ 舊題范德機門人集錄：《吟法玄微》，收入《元代詩法校考》，頁266、267。

¹⁰² 同上注，頁271。

¹⁰³ 關於月泉吟社，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對於月泉吟社發起的詩歌徵選活動，就其活動形式、主題、目的、參與人員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論證。參看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月泉吟社的結社與活動形式〉，頁72-80；〈月泉吟社作者群略考〉，頁81-115；方勇：〈月泉吟社考論〉，收入《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年正月十五日截止，共收到詩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從中甄選出二百八十名作為此次活動的優勝者，並於三月三日揭榜。¹⁰⁴現存的《月泉吟社詩》只收錄前六十名的詩作，經過考證，其中共有七人，是一人兩卷，所以實際收錄了五十三人的作品。

從《月泉吟社詩》可以發現不少科舉考試的痕跡。首先，從其活動形式來看，一是採用了糊名、謄錄的方式，確保徵選活動的公平性；二是邀請了方鳳、謝翱和吳思齊三人擔任活動的評判；三是公開揭榜，向獲勝者贈與禮物；四是在獲獎作品之下，都附有考官的批語。從這些方面來看，主辦者顯然是有意效仿科舉考試的形式來舉辦這次活動。

其次，參與這次活動的大多是宋季末年的太學生和進士，¹⁰⁵他們顯然對這一套操作方式十分熟悉，所以有人在〈回謝詩賞筭〉中，也採用了往日門生給座主寫謝啟的口吻。如第二名司馬澄翁就自稱「榜眼」，而稱評判者為「座主」。雖說只是一場文藝活動，大家卻也都循規蹈矩，心有靈犀。

再次，主辦方在解釋「春日田園題意」的時候，特別提請參與者注意：「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卻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為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¹⁰⁶這恰好說明了當時的詩普遍有「時文氣習」。

由此可見，現存的《月泉吟社詩》在很多方面體現了科舉考試所遺留下來的痕跡，幾乎可以視為科場習氣影響到詩壇的一個樣本。無怪有學者認為，舉行這次活動，也許是那些宋末遺民在重溫往日的青衫之夢。¹⁰⁷

結語

時至南宋中後期，隨著科舉競爭的激烈，舉業研習已然成為了一門特殊的學問，以至於有了特定的稱謂，曰「科舉學」。當科舉時文成為一般士人學業與生活的主宰，以往的詩歌、古文則被當作「外學」對待，被認為是無助於科舉登科的「致窮之道」。「科舉學」與「外學」的對立，造成了南宋後期詩歌地位日趨邊緣化。當時的士人階層普遍流行一種觀點，即認為只有那些科場失意的士人，以及失意無聊的山林退士，才會去寫詩。因之，科舉與詩歌，舉子與詩人，被視為彼此對立的兩個方面。換言之，「詩人」被視為是科舉體制之外的邊緣人群。於是，那些科場失意而專心於寫詩的江湖士人，就或主動或被動地被貼上了「詩人」的標籤，「詩人」的身份也因此被狹隘化、專屬化。通過這種對於「詩人」身份的重新界定，「場屋舉子」與「江湖詩人」無形中成為了兩個對立的群體。

¹⁰⁴ 吳渭（編）：《月泉吟社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二七上至二七下。

¹⁰⁵ 參看歐陽光：〈月泉吟社作者群略考〉，頁81-115。

¹⁰⁶ 《月泉吟社詩》，頁一下。

¹⁰⁷ 歐陽光：〈月泉吟社的結社與活動形式〉，頁79。

隨著南宋江湖詩人效仿術士之流成為奔走權門的謁客，詩歌也成為了江湖詩人的遊謁之具。同時，江湖詩人之間還盛行一種風氣，即到處干求名公題寫序跋以抬高身價。他們的這些做法，引起了科舉出身士大夫的反感和憎惡，甚至遭到像姚勉這樣狀元出身的士大夫的嚴厲批駁。但江湖詩人中終究是窮困潦倒者居多，因此他們也就特別喜歡發揮「詩窮說」來尋求慰藉。然而在劉克莊等人看來，失意科場才是導致他們窮困的真正原因。

元初科舉中斷四十餘年，這使江南地區的士人對於詩歌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許多昔日的舉子才華無所宣洩，轉而投身於詩歌寫作，甚而詩歌寫作也成為士人身份的一個重要標誌，由此詩歌地位得到大幅。尤其是對於那些喜愛詩歌創作的士人來說，解除了科舉之累，可以心無罣礙地寫詩。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科舉停廢也切斷了以往士人主要的進身之階，在仕進多途的刺激下，元初士人遊走干謁之風更趨盛行。這樣，原先在南宋落第士人之中盛行的游謁之風，也在元初蔓延到了整個士人階層。藉詩歌為「游謁之具」的習氣也在元初詩壇留存下來。

在昔日舉人向今日詩人轉變的過程中，元初出現了兩種論調：一種意見認為，過去在科舉時文上所下的功夫並不會妨礙詩歌寫作；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舉子因受科舉時文薰染過深，他們的詩作中總有擺脫不了的「時文故習」。這種意見顯然更占上風。另外，從元代的詩法、詩格類著作中，確實也可以看到科舉時文對於詩學批評的影響；而元初月泉吟社所舉行的詩歌徵選活動，更凸顯了科舉考試對於詩壇的深遠影響。

元初的科舉中斷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導致了宋元之交士人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但是如果從文學演進的角度來看，我們發現，元初的科舉停廢非但沒有造成南宋文學風尚的斷裂，相反，卻依然保持了其連貫性，甚而在某些方面還有其積極意義。這也許是我們在研治中國文學史時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

The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xistence and Abolish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An Investigation Focusing on the Changes of Poetic Circles

(Abstract)

Lin Yan

By the mid-Southern Song dynasty, exam training had developed into a special procedure that required the examinee to be fully preoccupied with exam studies in order to grasp the exam skills. By comparison, poetry and prose seemed to be of little importance. Thus, the position of poetry was marginaliz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mong the literati there developed an idea that only the examinees who failed to pas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the hermits who stayed away from official circles, were interested in poetry. Meanwhile, the fashion of travelling to visit the celebrities with requests for favour appeared among the marginal poets. Their behaviours incurred contempt from the upper strata literati who had earned their official posts through success in exams. As a result, the identity of “poet” became a special mark attached to a specific group. Furthermore, the popular opinion which prevailed in the late Song, that composing poems could result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reflected the real situation of marginal poets. But the key reason lay in their failure in exams.

Unexpectedly,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or forty year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freed the literati of south China from the bondage of exam learning. The erstwhile examinees turned their intelligence to poetry composition. Therefore, the position of poetry was elevated. However, the fashion of visiting celebrities was retained from the Song to the Yu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luence of exam training still existed. It appeared in the poem-composing, poetic criticism,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of literati groups. Consequently,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early Yuan did not bring about a ruptur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hich, on the contrary, maintained its continuity to a great extent.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fact cannot be ignored.

關鍵詞： 宋季 元初 科舉 存廢 詩歌

Keywords: late Song early Yu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existence and abolishment poems